

中共蘇聯關係在演變中

——從姚依林訪蘇談起

尹慶耀

今（一九八五）年七月九日，中共「國務院」副總理姚依林專機抵達莫斯科，對蘇聯進行正式訪問。到機場歡迎的蘇聯官員有：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伊·阿爾希波夫（I. V. Arkhipov）、外交部副部長米·卡比察（M. S. Kapitsa）、地質部部長葉·科茲洛夫斯基（Ye. A. Kozlovsky）、外貿部副部長阿·曼茹洛、國家對外經濟聯絡委員會第一副主席亞·卡恰諾夫、國家科學和技術委員會副主席弗·庫季諾夫和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席斯·西塔良。姚依林的隨員則有「外交部」副部長錢其琛、「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任甘子玉、「國家經濟委員會」副主任馬儀、「國家科學委員會」副主任楊浚和「對外經濟貿易部」副部長賈石等。

姚依林在莫斯科機場向記者發表書面談話。他說：

「應蘇聯政府的邀請今天前來貴國進行訪問，借此機會我謹向偉大的蘇聯人民致以誠摯的敬意和良好的祝願。」

「我這次訪問是對去年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阿爾希波夫同志訪華的回訪。訪問期間，我將同蘇聯領導人就發展中蘇之間的經濟貿易關係問題和其它共同關心的問題交換意見。我期待著這次訪問能取得成果，這將有助於中蘇兩國關係正常化的事業」①。

從上述雙方的人事安排及姚依林的機場談話中，我們得知姚等此行的中心任務，在經貿及科技方面，但他也希望能夠對雙方關係正常化有所幫助。

註① 香港·「文匯報」（一九八五年七月十日）第二版。

近年來，中蘇兩個共黨政權的關係確在改善中。遠的且不必說，單就鄧小平時期言，雙方的關係就從尖銳對立走向相當緩和。這當然有其內外的背景因素在。

二

一九七七年八月中共召開第十一次代表大會，當時還是華國鋒時期，大會全面肯定了毛澤東路線。華國鋒的政治報告和大會通過的黨章中，都斥責「蘇美」兩個超級大國和霸權主義，那是正式文件中，首次把「蘇」置於「美」之上，象徵著當時中共是以蘇聯為頭號敵人，所謂「反霸」幾與「反蘇」同義。

一九七八年二月中共召開五屆「人大」第一次會議，那次大會通過的「憲法」序言中，把「社會帝國主義」置於「帝國主義」之上，華國鋒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仍將「蘇」霸擺在「美」霸之前。華國鋒同時重提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四個現代化，並擬訂截至一九八五年止的「十年經濟規劃」。這是一項無視中共現實條件的「洋躍進」，剛一起步就遭週挫敗，造成損失而中途停止，給鄧小平一個奪權的好機會。同（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從一九七九年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這是鄧小平路線的初步確立。這條路線逐漸發展成為配合「以實踐檢驗真理」，把思想從極「左」的束縛下解放出來同時進行；在經濟方面，則進行調整改革，對內搞活，對外開放。當然會影響到對外政策。

不過，在七十年代，鄧小平也是國際反霸統一戰線的支持者^②。一九七八年後半，中共擴大外交活動，對蘇聯進行反包圍。八月間華國鋒訪問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和伊朗。同月十二日，中共接受日本的「第三國條款」，與日本簽訂「和約」。又對美降低姿勢，於十二月十六日與美發表「建交公報」。這後二者，鄧小平的影響力大於華國鋒，這從當時中共報章透露的鄧小平歷次有關談話即可察知。同年十月，鄧小平親赴東京為「和約」換文，他在那裏大放厥詞、鼓吹「反霸」。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中共與美國正式建交後，鄧小平又搶先，第一個於一、二月間赴美訪問。在那裏，他公開要求美國、日本、西歐和中共聯合對抗蘇聯，並聲言要「教訓」越南，給它一次「懲戒」。二月十七日，中共進攻越南，美國反應冷淡，日本公開反對，西歐多數國家漠不關心，蘇聯一方面支援越南，一方面警告中共，但本身並不直接介入。美蘇都不曾被拖下水，彼此避免直接衝突，中共軍事方面則遭受挫敗，造成人命與財政的損失。而北韓的羅津港、越南的金蘭灣，允許蘇聯作軍事使用，均與中共「懲」越戰爭有關。這樣的國際背景，迫使中共不得不對其國際反霸統一戰線策略作一番檢討。

註② 一九七四年毛澤東提出「三個世界」論，即由鄧小平於同年四月十日在聯合國第六次特別大會上宣布，那是國際反霸統一戰線的理論根據。

此外，領導者個人的因素，也是值得一提的。一九五八年大躍進失敗後，毛澤東退居第二線，讓劉少奇、鄧小平在第一線。慢慢地毛失掉實權，而僅成爲一個「祖先牌位」。這是毛澤東所不能忍受的，於是他就發動「造反奪權」的文化大革命，「文革」的主要旗幟就是「反修」。蘇聯是國際間的現代修正主義者，劉、鄧等是國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中國的黑魯曉夫」。毛澤東反蘇的動機有多種，而藉反蘇來鎮壓內部的反對者，也是其中之一。

鄧小平雖不敢正面反毛，但他要整肅的却是毛派，那包括「文革」餘黨和華國鋒的「凡是派」，他勿須再藉助於反蘇旗幟。而鄧小平的經濟路線，也不能再罵蘇聯是修正主義。事實上從一九七九年，中共已爲蘇聯摘掉修正主義的帽子。如前所述，七十年代末，鄧小平仍擬執行反霸即反蘇外交，「懲」越戰爭後，他就開始轉身了。

一九七九年三月卅一日中共「外交部」部長黃華邀蘇聯駐北平大使謝爾巴科夫 (I. S. Shterbakov) 密談，告知中共有意於一九八〇年四月十日「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期滿後不再延長，惟提議雙方舉行外長級以上的會議，以解決雙方懸而未決的問題。折衝結果，會談仍爲副外長級，在莫斯科舉行，經過五次預備會議，自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七日開始正式談判，但無結果，第二輪談判預定於一九八〇年在北平舉行。

一九七九年六月，隨同中共對外貿易代表團赴蘇參加貿易談判的中共中央黨校科學社會主義教研室的劉平，於八月十三日返平，曾在一次小型座談會上講話，簡介了蘇聯情況。九月間中共「中國全國蘇聯文學研究會」在哈爾濱召開「全國第二次現代蘇聯文學討論會」，會議紀要中談到蘇聯社會制度等問題。同年底在黑龍江省「文學藝術研究所」發行的「百家文藝」雜誌，發表以「關於布里茲涅夫時期文藝的政策若干情況和看法」爲題的論文。又曾任中共駐莫斯科「大使」、回平後轉任「外交部」副部長再率團赴蘇以首席代表身分參加改善關係談判的王幼平，返回中國大陸後在一次駐外使節會議上講話，也談到蘇聯問題，經香港「廣角鏡」雜誌於一九八〇年四月六日掲載。此外，一九七九年十一月「紐約時報」掲載該報記者包德甫 (Fox Butterfield) 的一篇特稿，透露了中共當局向其幹部們傳達的一份內部重要文件。這些文件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反對蘇聯對外的霸權主義政策，對其內政及經濟發展則加以肯定。這是一項轉變的跡象，在毛澤東時代是不會出現的。

三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廿七日，蘇聯進軍阿富汗，是近年來國際局勢演變的轉捩點，「低盪」因而死亡，東西關係再現緊張，北平、莫斯科、華盛頓的關係也有了較大的變化。

一九八〇年一月四日，美國政府宣布對蘇聯直接進行數項制裁，同時決定簡化北平購買美國某些商業和軍事兩用技術的手續

，並放寬對中共購買某些軍事項目的限制。同月上旬，美國國防部長布朗訪問中國大陸，提議出售一套美國高級技術的通訊衛星地面接收站給中共。

一九八〇年一月十六日，鄧小平在北平對萬名幹部講話，提出八十年代中共的三大任務是：反霸、統一、現代化。十九日，中共宣布無限期中止它和蘇聯一九七九年九、十月間舉行的副外長級「關係正常化」談判，聲言蘇聯不從阿富汗撤軍，談判即不恢復，作為對美國的回報。但同時，中共已在與蘇聯增進實質關係。

一九八〇年二月廿三日中國大陸各省開始在蘇聯陣亡將士紀念碑前放置花圈。蘇聯精通華語的中共問題專家、當時任蘇聯外交部第一遠東司司長的卡比察（已升任副外長），以解決蘇聯駐北平大使館內部事務為名，於三月廿日飛往北平，廿五日曾與中共「外交部蘇聯東歐司」司長于洪亮（升任副部長後轉往東歐任「大使」）會談三十分鐘。此後，雙方官方人士的非官方接觸增多，經貿關係人員及學者專家往來更較頻繁。此外，同年四月十日夜十二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期滿失效，但先一日「法新社」發自北平的報導說，北平「市政府」已下令將蘇聯大使館所在的「反修路」改名為「東直門北中路」，同時，又將舊使館所在的「反帝路」，恢復其原名「東交民巷」^③。這些，都是關係改善的象徵。

一九八一年雷根總統上臺後，中共和美國之間頗多齟齬。中共一則藉「關係倒退」等說詞及恫嚇口吻，對立場反共的雷根政府進行「先制」作戰；二則在美國對華軍售、「臺灣關係法」等方面進行糾纏，企圖破壞中美關係；三則也未嘗不是對蘇聯表態。同年七月六日，「人民日報」刊出署名解成章的「實行睦鄰友好政策和解決邊界問題」一文，內容強調：「我們的黨正在領導十億中國人民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而奮鬥。我們需要一個長期的國際和平環境，需要和平安寧的邊界，這就決定了我們繼續奉行和平友好的睦鄰政策」。文中又說明中共盼望能夠解決中印、中蘇、中越的邊界問題^④。如此明確地提出睦鄰政策，且特別觸及中蘇等邊界問題，自然是得到中共黨的同意，才可以發表的。八月間，美國和中共發表「八一七公報」，中共已從美國得到它當時能夠獲得的最大限度。於是，中共的對外政策，就要在美蘇之間縱橫捭闔、左右逢源了。

一九八一年十月廿二至廿三日在墨西哥的坎昆（Cancun）舉行的南北高峯會議中，美蘇尖銳對立。趙紫陽曾前往參加這次會議，他當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據中共「世界經濟政治研究所」出版的非公開雜誌「世界經濟與政治」所載「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王保勤等三人合撰「八十年代的中、美、蘇關係」一文透露，上述情勢促使中共乘機調整其對外政策，即：強化獨立自主方針，與美國保持一定距離，同蘇聯改善關係。中共認為在美蘇之間採取有主導性的彈性政策比較有利^⑤。

註③ 香港：「大公報」（一九八〇年四月十一日）第二版「縱橫談」欄。

註④ 轉自香港：「文匯報」（一九八一年七月七日）第二版。

註⑤ 轉自日本：「讀賣新聞」（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十七日）第五面，原報導未註明該雜誌出版日期。

一九八二年三月廿四日布里茲涅夫在鄰近中國大陸的塔什干演說，對中共仍有批評，但其內容有幾點值得注意：(一)承認中共內部仍有社會主義體制存在；(二)聲言蘇聯絕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兩個中國」構想，完全承認中共對臺灣的主權主張；(三)對中國大陸絕無領土要求，願討論加強中蘇邊境地區可能採取的互相信賴措施；(四)準備在無任何先決條件下，在相互尊重對方權益、互不干涉內部事務——當然不損害第三國的基礎上，改善雙方關係。中共對此未像過去般一口回絕，表現出相當溫和的反應。而雙方的實質往來，已較前加強。

四

一九八二年九月一日起，中共舉行第十二次代表大會，鄧小平在開幕詞中，把他於一九八〇年一月提出的八十年代三大任務的順序，由反霸、統一、現代化改為現代化、統一、反霸，那是值得注意的改變。

九月一日胡耀邦在大會提出的「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和九月六日大會通過的黨章總綱中，闡述了中共當前的對外政策，其中值得注意且與本文有關的，可撮述數端如下：

第一、特別強調獨立自主。綜合各種文件，可知中共的獨立自主有下述內涵：決不依附任何大國或者國家集團，決不屈服於任何大國的壓力，決不與任何大國結盟。這可稱為三不主義。這樣的解釋，可使蘇聯認為中共不致倒向美國，可使美國認為中共不會重返蘇聯懷抱。中共也常常說它不搞什麼「等距離」，自己不玩牌，也不讓別人把它當牌玩。

第二、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相結合。中共黨章上強調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胡耀邦在「十二大」報告以及中共「外交部」文章「三十五年的中國外交」^⑥一文中，就鼓吹把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相結合，作為中共處理對外關係的根本出發點。胡耀邦還說：「中國的對外政策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科學理論為基礎的，是從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的。它有長遠的、全局的戰略依據，決不遷就一時的事變，不受任何人的唆使和挑動」。把這些話同其他的詞句合起來看，就可知道，中共推行經濟外交，爭取外來資金、科技的援助，是愛國主義、實用主義；壯大自己，增強本身經濟力、軍事力，提高在國際間的影響力，同時「發展人類進步事業」（意指社會革命——筆者），「中國把堅決同第三世界其他國家一起為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殖民主義而鬥爭，看作自己神聖的國際義務」（在第三世界的鬥爭，是中共世界革命的主要環節——筆者），是實用主義、理想主義。因此，若認為現今中共只重實用主義、放棄理想主義的想法，是近乎武斷而且是片面性的。

註⑥ 原刊中共為紀念其政權成立三十五週年而出刊之《光輝的成就：中華人民共和國三十五週年文集》下冊。

第三、對其他共黨及共黨政權的態度。黨章總綱中曾說明：「在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發展我國同世界各國的關係。在馬克思主義基礎上，按照獨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內部事務的原則，發展我黨同各國共產黨和其他工人階級政黨的關係」。過去，中共堅持「和平共處是指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之間的關係，不能隨心所欲地加以解釋」^①。而今黨章把適用範圍擴大到「世界各國」，胡耀邦報告還明白說包括社會主義國家在內，那顯示中共亟求改善同蘇聯、東歐的「國家」關係。至於黨與黨的關係，不提列寧主義而只提馬克思主義，是準備拉攏反列寧主義的特別是歐洲共產主義共黨，但那並不妨害同奉行列寧主義的共黨增進關係，因為信奉馬克思主義，它們還是一致的。

綜上所述，可知中共的獨立自主，雖同時對美蘇適用，但莫斯科和北平比北平和華盛頓之間的距離要近些。因為在上述各點中，蘇聯還可以跟中共找到一些共同點，美國則完全沒有這種可能。

中共「外交部」文章說：「蘇聯有些人曾一度認為：中國為發展經濟和對付美國，只能依靠蘇聯，因此可以迫使中國屈從於它。後來美國又有些人認為：中國為進行四化建設和對付蘇聯，就有求於美國，因此企望中國會接受其損害中國主權、干涉中國內政的要求。蘇美這些如意算盤都落空了。事實證明中國是不可侮的。正如鄧小平同志所說：『任何外國不要指望中國作它們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國會吞下損害我國利益的苦果』」^②。

撇開其他因素不談，中蘇之間有著漫長的邊界線，而且中共現仍處在蘇聯勢力包圍之中，它會同蘇聯長久對立嗎？若果美蘇之間真有軍事衝突爆發，北平將作如何考慮？它會使中蘇邊界變成美國國防第一線嗎？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

五

中共和蘇聯關係的現況如何呢？

自八十年代以來，中共和蘇聯間的體育、文化及其他交流已飛躍式的增強。雙方經已中止的副外長級關係正常化談判，於一九八二年十月即中共「十二大」之後，改名「磋商」在北平恢復舉行，翌（一九八三）年三月在莫斯科舉行第二輪「磋商」，此後即成爲慣例，每年兩次在莫斯科和北平輪流舉行，第六輪「磋商」已於今（一九八五）年四月在莫斯科舉行完畢。中共利用布

註⑦ 「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中共中央對蘇共中央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來信的復信」，北平：《人民日報》（一九六三年六月十七日，七月廿日重刊）。

註⑧ 同註⑥所揭書，一二四頁。

里茲涅夫、安德洛波夫、契爾年科三次喪禮，乘機與蘇聯改善關係。此外，中共外長吳學謙在聯合國與蘇聯外長葛羅米柯會過面。去（一九八四）年十二月阿爾希波夫訪問中共，今年七月姚依林訪問蘇聯，雙方官員接觸就提升到副總理級。

中共的「人代會」和蘇聯的最高蘇維埃，名義上相當於自由國家的議會。今年三月三日，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張承先率團訪蘇，他們此行是應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的邀請，在莫斯科會拜會最高蘇維埃主席，那是二十年來的首次。其實，很多方面的關係，都是中斷二十年之後再度恢復，其所以受人重視也在此。最近消息透露，中共的「人民日報」和蘇共的「真理報」決定互派記者，中共的「經濟日報」和「光明日報」也準備派遣特派員前往莫斯科。中共的「新華社」和蘇聯的「塔斯社」已各有三名記者交換，常駐對方「首都」^⑨。六月四日，該二社代表在莫斯科簽署了一項互派工作人員進行短期訪問議定書。雙方將增派記者到對方採訪新聞，擴大情報交換幅度。而中蘇共的工會機關報——中共的「工人日報」與蘇聯的「勞動報」也將於年內交換記者^⑩。

值得注意的是雙方的經貿關係。一九八二年二月，中共和蘇聯簽訂鐵路貨運協定，中共貨櫃可經由西伯利亞鐵路轉運至西歐和伊朗。四月，雙方在北平簽訂年度貿易協定，預定一九八二年度雙方貿易額較上年增加四五%。一九八三年三月十日，中共「對外經濟貿易部」副部長賈石，在莫斯科與蘇聯對外貿易部副部長格里辛（I. T. Grisin）簽署一九八三年貿易與支付協定，雙方同意增加貿易額。中共自蘇聯進口鋼材、有色金屬、木材、化肥、水泥、平板玻璃、化工品及機械產品等；中共向蘇聯出口礦產品、肉與肉製品、食用植物油與油料、綢緞、棉花、紡織品與服裝、輕工業品、茶葉、畜產品等^⑪。同年十月，中共蘇聯副外長第三輪「磋商」時，雙方協議下年度貿易額提高為一九八三年的八億美元之二倍^⑫。一九八四年二月九日，蘇聯貿易代表團團長、外貿部副部長格里辛飛抵北平，雙方簽署一九八四年易貨和付款協定。稍後據胡耀邦宣稱雙方貿易將增加六〇%，達十二億美元，而不是先前傳說的增加一倍。又據一九八五年四月九日胡耀邦對港澳記者談話時，也證實一九八四年雙方貿易額為十二億美元^⑬。他又說，中共和蘇聯都願意加強經濟交往。一九八五年的貿易額可達二〇億美元，不算大，但比去年增加了百分之七十幾。他又提到姚依林訪蘇，準備簽署一個長期貿易協定。中共提出的單子，到九〇年要發展到六〇億美元，蘇聯的單子沒有這麼大，他們開的單子只有三十幾個億^⑭。事實上，姚依林在莫斯科於（一九八五年）七月十日與阿爾希波夫簽署的五年貿易

註⑨ 日本：〔朝日新聞〕（一九八五年五月廿二日）第七面。

註⑩ 香港：〔文匯報〕（一九八五年五月卅日）第二版。

註⑪ 新華社（一九八三年三月十日）電。

註⑫ 日本：〔讀賣新聞〕（一九八三年十月廿九日）第五面。

註⑬ 香港：〔文匯報〕（一九八五年四月十日）第二版。

註⑭ 同註⑬。

協定，確實未達到中共的期望。

一九八二年十月中共與蘇聯副外長級第一輪「磋商」時，雙方同意重新開放關閉了二十餘年的新疆省兩處邊界貿易站，大概是新疆的疏附（Kashgar）與蘇聯的奧什（Osh），新疆的伊寧（Yining）與蘇聯的潘菲洛夫（Panfilov）。事後陸續獲悉蘇聯已開放其吉爾吉斯共和國東部與新疆省交界處的邊界城鎮里巴奇（Ribachi），與中共進行邊界貿易。一九八三年雙方恢復在新疆的霍爾果斯（Huoguos)和吐爾戈特（Toerge)交接貨物。當時新疆正在拓展蘇聯、西亞和阿拉伯國家的外貿市場。進入一九八四年，「新華社」發自烏魯木齊的電訊透露，根據中共蘇聯貿易合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同年將向蘇聯出口九〇〇萬公尺優質棉布^⑮。

作為開發大西北（計劃包括新疆、陝、甘、青等省）計劃之一環，中共於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初，邀集美日等數十個國家的代表約九百人，在西安舉行「陝西省國際經濟技術合作會議」，蘇聯駐北平大使館副商務代辦捷夫斯基也前往參加，他對中共「世界經濟導報」記者表示，蘇聯可以與中國西北地區直接貿易方式，協助此一開發計劃。他當時建議修築由新疆通往蘇聯的中蘇間第四條鐵路^⑯。

早在一九五六年四月米高揚（A. I. Mikoyan）訪問中共時，就給與中共二五億盧布貸款，以加速修築蘭州—迪化—阿克斗卡（Aktogay）鐵路，那是早年中共和蘇聯合作開發亞洲心臟部基地的戰略計劃的一部分。由於後來雙方關係惡化，這條路迄未築成。現今捷夫斯基所提的新鐵路，是由新疆的烏魯木齊（即迪化）附近向西延伸約四七〇公里，直達蘇聯的阿拉木圖（Alma-Ata）附近，與蘇聯的鐵路接軌。這條鐵路的建設，對開發新疆西北部的石油、煤炭當有貢獻。然而，它不僅具有經濟價值，同時也具有軍事意義。據中共的英文「中國日報」透露，該路第一期工程即從烏魯木齊到新疆西北部城市烏斯約二四〇公里的路線，預定三年完成，此後再建築通往蘇聯的二三〇公里路線，總投資額估計二億三、二〇〇萬美元。現今已有超過兩萬人的技術專家和工人從事第一期工程^⑰。看來，中共已不虞和蘇聯之間會有軍事衝突發生。

依中共黑龍江省負責人陳雷的說法，該省與蘇聯之間，有長達三、〇一〇公里的邊界線，雙方人員往來有綏芬河、黑河、同江三個口岸。前年起邊界貿易業已恢復，去（一九八四）年貿易額二、四〇〇萬瑞士法郎，今年貿易額可達五、〇〇〇萬瑞士法郎（僅黑龍江省，不包括內蒙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中共輸出經由滿洲里（原屬黑龍江，現屬內蒙自治區），輸入則綏芬河、

註⑮ 香港·〔文匯報〕（一九八四年三月十八日）第一版。

註⑯ 日本·〔日本經濟新聞〕（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廿八日）第六面。

註⑰ 轉自日本·〔朝日新聞〕（一九八五年五月三十一日），第七面。

滿洲里兩方均可使用。黑龍江主要輸出糧食、日用品、紡織品、肉類、蔬菜以及陶器、罐頭等。去年，胡耀邦訪問黑河，曾稱「南深北黑，比翼齊飛」，現中共準備開放同江及黑河^⑭。

一九八五年七月五日，中共指定內蒙古自治區的滿洲里市和二連浩特市以及青海省的湟中縣，列入甲類開放地區，外國人可不必事先申請而自由訪問該等地區。滿洲里在中蘇邊界，二連浩特則在內外蒙邊界，上述措施特別是前兩個地區的開放，被認為是中共蘇聯實質關係改善的一環^⑮。

六

一九八五年七月十日，姚依林在莫斯科與阿爾希波夫簽訂了兩項協定：（一）「關於一九八六年至一九九〇年貿易及償付協定」——規定雙方總貿易額達一二〇億盧布（一四〇億美元）。一九九〇年雙方年貿易額達三〇億盧布（三五億美元），比一九八五年翻一番。中共將向蘇聯提供礦產品、大豆、玉米、豬肉及其製品、水果、茶葉、棉布、針織品、縫製品、輕工土畜產品、手工藝品、化工品等貨物。蘇聯將向中共提供鋼材、木材、化肥、有色金屬、發電設備、鐵路機車輛、汽車、飛機等貨物。（二）「關於在中國建設和改造工業項目的經濟技術合作協定」——雙方將在設計、提供技術資料、供應設備和派遣專家、技術人員方面進行合作。蘇聯將在中國大陸援助興建七間工廠，並在發電廠、冶金、機器製造、煤炭、化工及運輸方面協助十七間工廠改造為現代化^⑯。

中共「七五」計劃，係以原有企業的技術改造和改建、擴建為主，上述協定對中共而言，實屬絕對需要。更重要的是，一九六〇年蘇聯經濟制裁中共時，停止援助並撤退專家，廿五年後蘇聯專家又重臨中國大陸，這件事本身就值得重視。據悉，中共和蘇聯將在瀋陽和列寧格勒恢復互設總領事館，那必是象徵著雙方的商務及僑務的增加。

此次中共和蘇聯的五年長期貿易協定，貿易額不如預期（二〇〇億美元）之多。而姚依林訪問蘇聯，也未在政治方面獲得突破性的進展，甚至不曾會晤到戈爾巴契夫，這是因為蘇聯改善對中共的關係，係從其全球戰略着想，即一方面分化中共與美、日的關係，一方面藉與中共修好，加強東歐國家對莫斯科的向心力，從而在國際舞臺上提高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地位及影響力。姚依林與阿爾希波夫會談時，又闡述了中共「獨立自主」的外交方針，與蘇聯總理吉洪諾夫會談時，又提出「三大障礙

註⑭ 「中蘇和解的鼓動」，日本：「朝日雜誌」（一九八五年七月十二日出版），七、八頁。

註⑮ 參閱日本：「朝日新聞」（一九八五年七月十日）第七面。

註⑯ 參閱香港：「文匯報」（一九八五年七月十一日）第二版。

「問題。中共明知沒有結果而仍然把它提出，目的在求對蘇關係暫時維持政經分離。它不希望同蘇聯改善關係的步驟邁得太快，以免引起美、日及其他西方國家的猜忌，斷絕了資金及科技援助的來源。

可是，政經分離究竟是不容易的。中共和蘇聯之間，在意識形態與最終目標等方面是一致的，它們之間存在的只是個體利害的衝突。中共向蘇聯要求的只是「獨立自主」、「完全平等」……，它與西方之間却存在著意識形態以及社會體制的衝突，說真的西方的自由的政治、經濟體制，正是中共要埋葬的對象。關於這一點，是研究中共和蘇聯關係時不能夠忘記的。

共匪禍國史料彙編

本書第一、二、三冊，按時序先後編纂，紀述共黨自建黨至抗戰勝利之禍國罪行。第四冊起，改按專題編纂為「農村變亂(一)——查田運動」，第五冊為「農村變亂(二)——蘇維埃暴力分地」，第六冊為「農村變亂(三)——抗日戰爭時期的減租減息與武裝叛亂時期的清算鬭爭等」。

十六開本 六巨冊

工本費 新臺幣 一千六百八十元
美金 四十七元

郵資另加 國內：新臺幣五十元
國外：平寄美金 十五元
航空美金 六十五元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代售
限閱資料憑機關學校公函購用。